

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

——浅析《万历十五年》的魅力所在



□徐冬

作为一部学术专著而畅销30余年，《万历十五年》堪称一个奇迹。“开口不谈‘十五年’，自称‘明粉’也奇怪”，这句调侃之语，为这部书的巨大影响力做了最有力的注脚。不久前的热播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，“毁”了学者型官员高育良的，也是这部《万历十五年》。

明万历十五年，公元1587年，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平淡的一年，既没有大的天灾，也没有大的人祸。然而，大风起于青萍之末，在貌似波澜不惊的表象下，掩藏着皇权统治的乏力、官僚体制的钝化和意识形态的迷乱，烜赫一时的大明王朝已然走进了历史死胡同，丧钟已隐隐响起。把万历十五年作为时间切入点，大处着眼，小处入手，步步深入，层层剖析，在这里，史学家黄仁宇以高超的手法做了一次“微创手术”，表面虽不着痕迹，却在深层次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等“五脏六腑”进行了鞭辟入里的“病理”分析。

独特的视角之外，作者黄仁宇在书中对所涉历史人物进行了最大程度的“立体”还原，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个个有血有肉、活泼泼的人物形象，这也是《万历十五年》保持持久吸引力的原因之一。受“非此即彼”二元对立评判模式的影响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刻画“脸谱化”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“标签化”，如，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个混账透顶的“懒政昏君”，海瑞就是一心为民请命的“清官”“完人”，戚继光就是没有丝毫人格瑕疵的民族英雄，等等。然而，通过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我们却发现，朱翊钧之所以近三十年不上朝，乃是出于对各种繁缛礼仪的反感，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失望，以及对不能立自己心爱的儿子的儿子为太子的“报复”。他的看似不负责任的“懒政”之举，其实笼罩着一层“哀大莫

于心死”的悲凉之气。同样，对于千古第一清官海瑞，黄仁宇也没有一味地褒扬，反而用了“古怪的模范官僚”这一极不客气的话语进行评判。作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和坚定践行者，海瑞一生彰显着服务公众而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，这种崇高精神以及海瑞自身无懈可击的私德，注定了他会被供奉到道德的神坛，而被历史、当下和未来所怀念、铭记。然而，把千年前的教条、把形而上的伦理道德照搬过来，用于应对纷纭复杂的现实政治操作，海瑞之不合时宜、“古怪”一望可知。毕竟，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当不得真。“如万年青草，可以做霜雪，而不可充栋梁”，同时代的思想家李贽对海瑞的评价，可算是一针见血。

作为抗倭民族英雄，在文学影视作品里，戚继光总以“高大全”的形象示人。然而，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位威大帅：他豁达豪爽，却也深谙政治“潜规则”，多次以金钱、美女贿赂政治靠山张居正等；他体恤下属，却也经常显露露锋芒手段，士兵离队小便就会被处以罚耳酷刑；他自奉甚简，却也率性而为，喜欢吃北京煮猪头不惜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；他畏妻如虎，却在暗中娶妾3人，生子5人，直到儿子长大，他泼辣的夫人还不知将门有子……擦掉被涂抹的一层层厚脂粉，英雄得以以本来面目示人，这张面孔虽然没有臆想中的那么完美无瑕，甚至带有一些丑陋，但因其真实，我们会更觉可亲、可爱，从而所产生的敬仰、爱戴也才会发自肺腑。一句话，不把历史人物强行放在二元对立评判模式的标准像框里，而结合史实，多角度剖析，“立体”式还原，这使《万历十五年》收获了巨大成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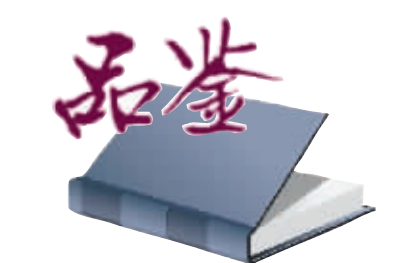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对于一部历史学专著而言，有真知灼见的史识应是衡量其水准高下的最重要标杆。当下学界，史识的浅陋已成为一大痼疾。如，对于明朝的衰亡，不少学者仍因袭“名亡于崇祯，实亡于万历”的老调，把帝王的个人品质视为决定国家兴衰的主因，而缺乏对当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等的全方位的考量，所得出的史识自然不能使人信服。反观《万历十五年》，通过描述万历帝以“懒政”为手段和文官集团进行博弈，揭示了君主专制政体的深层次病态；通过对张居正“人亡政息”的慨叹，指出了强人治国的局限；通过对海瑞悲剧命运的透视，道出了个人道义理想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的苍白无力；通过对李贽思想的全面剖析，论证了当时思想界的苦闷和“无路可走”……黄仁宇以其“大历史观”享誉学界，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，这一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。跳出“就事论事”的学术桎梏，拉长时段，以一种更全面、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历史，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落窠臼、振聋发聩。

概而言之，《万历十五年》所得出的史识主要涵盖以下两点：其一，明朝乃至

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，在于采用疏阔、僵化的道德准则治国，而没能建章立制，实现精准的数目化管理；其二，个人的品德、能力无法从根本上弥补体制的不足，人治靠不住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，这两点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。不久前，“于欢刺死辱母者”一案在各大媒体引发轩然大波，在对该案的讨论中，出现了明显的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的倾向。殊不知，以道德评价作标准，很难保证不出现主观性、随意性和专断性，公正司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。道德至上的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，近年来，受道德泛化的影响，“道德掩盖事实”“道德绑架常识”“道德评判干扰司法审判”等现象屡屡出现，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巨大挑战。为此，必须以史为鉴，走出“以道德代替法律”的误区。

同理，与道德至上相呼应，以推崇圣贤贤相、清官廉吏为标志的“人治”意识在当前也有深厚的土壤。持此种观念者，片面夸大个人意志、能力在推动社会前进中的作用，而忽视了建章立制、完善体制这一最根本的问题。《万历十五年》中，为确保新政顺利推行，“救时宰相”张居正可算是尽忠铁血手腕，其意志之决绝、风格之强劲，整个历史上都鲜有人与之相匹敌。可即便如此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建设和精准的数目化管理，在张死后，新政很快灰飞烟灭，张居正本人也落了个被抄家清算的悲惨下场。同样，由于戚继光的个人努力，他所率领的戚家军一度武力值“爆棚”，战功赫赫，可由于“重文抑武”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，以及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，戚家军很快埋没于历史烟尘，整个大明王朝的武力废墟也日甚一日。由此可见，个人的意志、能力无法弥补整个体制的不足，人治的结局只能是“人亡政息”，确保社会长足进步和发展的唯一“诀窍”只能靠建章立制，把各项事业和活动真正纳入制度化、法治化管理的轨道。

金无足赤，同理，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。毋庸置言，《万历十五年》以论代史的倾向比较明显，在研究理念上也受西方学界“中国停滞论”的影响，有先入为主、预设立场之嫌。虽然如此，《万历十五年》仍以独特的研究视角、生动的语言叙述、立体的人物剖析和卓越的史识见解，实现了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，为史学大众化探索出一条蹊径。



永不褪色的真实

——走进炭精画

炭精画，一种以炭精粉为颜料，以擦笔、药棉、橡皮等为绘画工具的特殊民间绘画形式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炭精画以“层次丰富、细腻逼真、永不褪色”等特点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。近年来，随着摄影技术和电脑绘画的普及，对炭精画的追捧已日趋冷淡。即便如此，因其历史悠久、独具魅力，炭精画在今天仍有相当数量的“粉丝”，一些专业和民间的画师也用心坚守着这一艺术形式，使这份“永不褪色的真实”得以传承。



□本报记者 徐冬 摄影报道

走进东城区凤路陈向阳的画室，一幅幅炭精画映入眼帘，里面的人物或微笑或严肃，或端庄或洒脱，各具神态，栩栩如生，甚至连额上的每一道皱纹、头上的每一根发丝都纤毫毕现。

此时，陈向阳正参照几张一寸大小的照片，为一名中年女性进行炭精画肖像还原。“顾客送来的大多是泛黄的老照片，保存好的，五官能看清楚，还有好些是非常模糊的。”这些模糊不清的老照片，经由陈向阳的一双“魔力”之手，最终都被还原成一幅五官清晰兼具神采的炭精画。作画时，陈向阳全神贯注。只见他看一眼照片，铅笔就在画纸上轻轻扫过，如蜻蜓点水一般，笔和纸接触后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很快，凭借多年作画的娴熟技巧，陈向阳勾勒出照片中人物的大致轮廓。“画人物肖像应先对顾客提供的照片等参照样件的形体结构、个性特征、光线角度等进行观察，然后用九宫格把人物形状，从上到下，由左至右，先外后内按比例扩大勾勒在纸上。”

勾勒出人物轮廓后，陈向阳拿出一个装有炭精粉的小管子，拆开包装，把炭精粉倒进一个类似砚台的物件内研磨，使炭粉更加均匀。随后，他弯下腰，拿起满满一把毛笔，蘸上炭粉轻轻刷上去。“刷的时候很讲究，只能用浅入深，浅了可以补点炭粉，可如果太深就糟了。陈向阳一边介绍，一边根据情况，变换着使用不同型号的毛笔刷粉。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一幅精致的炭精画终于大功告成！
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顾客提供的参照样件多种多样，有像素高的数码相机相片，有年代已久模糊残缺变色的老相片，也有利用社会保障卡、身份证等证件上的头像的……不论是哪一种样件，陈向阳都能做到细致分辨，反复揣摩，在人物轮廓和神采中定出画意，再现人物的本来面貌。

炭精画，一种以炭精粉为颜料，以擦笔、药棉、橡皮等为绘画工具的特殊民间绘画形式，以“层次丰富、细腻逼真、永不褪色”等特点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。早在清末，随着西洋画技法

传入我国，炭精画也进入人们的生活。那时，长者去世之后，子女大都会请画师画一幅逝者炭精画肖像留作纪念。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炭精画火爆一时，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业务，从早忙到晚。”陈向阳告诉记者，那时，一张装裱好的炭精画像画卖到二三十元不成问题。

“其实，对于炭精画创作者而言，最大的成就感还不是单纯地获得经济收入，而在于通过这种艺术形式，能用画笔为很多人完成心愿。”据陈向阳回忆，有一年冬天，一位神情憔悴的女子走进画室，把一张紧捏在手心的黑白照片递给他，请求他画出来。原来，照片中的人物是该女子的母亲，刚刚去世，为了把母亲的音容笑貌铭记在心中，该女子想到了用炭精画还原照片。女子的孝心打动了陈向阳，他用最快的时间完成了画作。当那个女子从陈向阳手中接过母亲的炭精画遗像时，一下子跪倒在地，手抚摸着画，哽咽着，好半天才喊了一句“妈！”过了好一会儿，女子抹干眼泪站起身，对站在一旁的陈向阳谢不绝口，由衷感谢他帮自己实现了心愿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人用上了相机、电脑，摄影技术和电脑绘画得以普及，昔日对炭精画的热烈追捧已日趋冷淡。虽然如此，在今天，炭精画仍有相当数量的“粉丝”，究其原因，打动人的仍是那份永不褪色的真实。

“炭精性稳定，有较强的附着力，用它创造出来的作品，保存个七八十年都不成问题。”此外，相较于相机、电脑拍摄、制作出的图片，炭精画有立体感强、色调层次分明、细腻逼真等优点，更显得肃穆庄严。“很多人都想给逝去的亲人画上一张遗像，可以负责地说，只有选择炭精画这种形式，才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。”在陈向阳看来，只有精雕细琢的东西在情感上才会显得更厚重、更持久，手工创作时的那份虔诚是机器批量生产所无法代替的，那份厚重和情意是一针一线的密织出来的……

范仲淹遇“贵人”

□张军霞

相传宋仁宗在位时，曾经因为范仲淹的弹劾而罢免了当时的宰相张世逊。后来，宋仁宗恢复了张世逊的官位，却又开始对范仲淹不满。有一天，宋仁宗对张世逊说：范仲淹当年曾经有奏疏，请求废掉朕，现在是处置他的时候了。张世逊却说：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，范仲淹应该被杀，但我们没有看到奏疏啊。

宋仁宗说，虽然没有看到奏疏，但屡次有人跟我这样说，说明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，不如先议定一下范仲淹的罪该怎么定。张世逊回道：他的罪的确不小啊，但是没有证据，就没有办法执法，请陛下一定要查清楚。此后，由于担心皇帝突然治范仲淹的罪，张世逊每过几天，就询问奏疏的事情，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，他居然连续追问了十几次。后来，宋仁宗被问得耐烦了，生气地说：我现在还是没看到范仲淹的奏疏，但很多人跟朕这样说过，他的罪一定要判，可以轻判一

些。张世逊却不依不饶地说：一个臣子要废掉皇帝，如果事情属实，哪能从轻重落呢？既然没有文字证明，就不能因为空言而治罪呀！

看到宋仁宗的怒意有所缓解，张世逊又提出一条大胆的建议：您以前对范仲淹有怀疑，所以让他到外地去任职，现在既然不怀疑了，可以稍微升他的官，安慰一下当臣子的心。宋仁宗被张世逊的诚意感动了，竟然对他说的话表示同意。

张世逊被弹劾而不记恨，反而屡次替对方说好话，真可谓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而范仲淹当初弹劾张世逊的时候，一定不会想到在自己官场上失意、失去皇帝信任的时候，正是因为这个人暗中相助，自己才没有因为空言而获罪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张世逊不是他的对手，而是他生命中真正的“贵人”。



承传千秋雅韵 歌咏时代新声

——记我市知名词作家何德林

□谢东明

2014年2月，辽宁抚顺市委宣传部、雷锋生前所在团、颂今音乐工作室三家单位共同编辑出版了一本《学习雷锋歌曲新编》，仅这一本学习雷锋歌曲集里，由我市词作家独立作词创作的歌曲就有两首，分别是《捧读雷锋日记》《雷锋故乡雷锋多》。其作者为我市年近八旬的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四川音乐文学学会会员、四川大众音乐协会会员、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、知名词作家何德林。

何德林1941年出生于重庆市璧山县。1964年从原西南师范学院（现西南大学）毕业后，到平昌师范任教，先后担任副校长、校长、总支书记，1993年调达州广播电视大学工作，任校长、党委书记，2001年6月从达州广播电视大学退休。

何德林出生在一个充满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大家庭，自幼喜欢文学音乐和艺术。初中阶段开始创作儿童民歌诗，高中阶段学习作词作曲。1959年，其作词作曲歌曲《钢铁战士之歌》等五首被收入《璧山创作歌曲选》。参加工作后，何德林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儿童民歌诗，1965年6月，参工后的处女作《我操练在大巴山上》在《通川报》发表。1982年开始通过《心声歌刊》“歌词创作刊授”系统学习作词，第一首公开发表歌曲是《我家喂了两条牛》在《四川歌词》1983年2期发表。第一首获奖出版词作歌曲是1983年5月《蓝天里有一对远去的白鸽》（范萍辉曲）在《心声歌刊》和《摇篮儿童文学》征歌中获奖，并选进《快乐的百灵鸟》歌曲集出版。

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刊物《儿童音乐》2005年第2期发表了何德林的歌词《我的心愿》，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音乐刊物上发表作品，后被谱曲，在《儿童音乐》2005年10期发表，并入选《中国校园歌曲》（五）出版。此后，他的歌词和词作歌曲陆陆续续在《词刊》《歌曲》和各省市音乐报刊公开发表。

何德林一生主要职业是教育，教学和社会工作十分繁忙，但他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创作，至今已有600余首作品见诸国内外音乐和文学报刊，题材涉及祖国锦绣山河、风土人情，好人好事、历史文化、时代变迁、改革成就、道德风尚等。特别是少儿歌词和词作歌曲量大质优，为我国少儿音乐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何德林尤其令人敬佩的是，年岁越高，创作激情越旺，而且总能跟上时代潮流。他创作的辉煌时期是在他2001年6月退休以后。退休后，他把绝大部分时间都拿来从事歌词创作。为了有助于更好地创作，他六七十岁了还学电脑操作，并在网上开辟了博客、QQ空间、音乐空间、视频空间和其它网络阵地。他还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官网开辟了个人乐博，在央视网的博客网站开通了个人电视台。在这些平台上，他结交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词友、曲友、音乐人、歌手。

仅最近十年，何德林就有54首歌词和词作歌曲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刊物《词刊》《歌曲》《儿童音乐》发表，140多首歌词、词作歌曲在《新歌诗》《歌词月报》《音乐天地》《校园歌声》《中小学音乐教育》《当代音乐》等几十家音乐刊物发表。近年，还有歌词、词作歌曲在香港、台湾、马来西亚、苏里南发表。《过家家》《早当家》《老师的身影》《春天的童话》《写给祖国妈妈的悄悄话》等20首代表歌词，分别荣获全国各种歌词比赛大

奖；《蓝天里有一对远去的白鸽》《巴山红杜鹃》《在祖国的怀抱里》《玉树小伙伴别怕》《捧读雷锋日记》《文明谣》等29首代表词作歌曲，则分别荣获全国各种歌曲大赛奖励。何德林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《让明天更加繁荣富强》《锦绣南山我的爱》也荣获全国征歌优秀奖。近年来，何德林有19首词作歌曲分别被多家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如独立作词歌曲《山村小歌手》（彭念七曲）被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选进小学《音乐》欣赏教材出版。

何德林的业余创作不仅善于把握时代脉搏，发现亮点，引领潮流，还善于自我否定，追求更高更优。他的许多获奖歌词和词作歌曲都是几经修改才最后定稿的。近年修改定稿推出的歌词和词作歌曲《文明谣》《山里娃之歌》等，已经数易其稿，历经十多年，不能不说是“十年磨一剑”。

何德林在自己持之以恒地进行业余创作的同时，还乐于帮助年轻词友曲友，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指导年轻人在创作上精益求精，不断提升作品质量。经他的长期指点和帮助，不少年轻的词作者曲作者已经活跃在全国各地，成为知名人物。

何德林的精神和成就深得业内高度评价。2010年10月，他的业绩被收入《中国音乐家图鉴》。2012年12月，“中国文艺在线”开辟专栏“中国知名词作家何德林”，对他的艺术成就、词作歌曲、获奖作品等做大力推介。同年，百度百科也开辟“何德林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）”词条，对他的主要成就、代表作品、获奖作品作了介绍。



5版

文史·艺境

达州日报

生活

周刊

主编：蒲建国
编辑：何晓丽
廖晓梅

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
dzbszhk@126.com 2389342-407